

中華學界

中國學報

學報



護國軍
紀事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南洋

大國

國貨月刊報

學
西
真聲

辛亥革命时期 期刊介绍

第五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XINHAI GEMING SHIQI QIKAN JIESHAO

(第五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丁守和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875印张 615,000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0,001—2,800

书号11001·897 定价 5.20元

说 明

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大量期刊^①，是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报刊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除影印过少数几种外，还有许多散佚不全，对现存的刊物也缺乏有系统的整理研究。因此，我们确定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些刊物作些比较系统的介绍，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史创造必要的条件。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和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从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各种刊物约有七、八百种之多，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刊物，有关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财政经济、学生、妇女、学术、宗教、自然科学的刊物，还有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刊物，等等。我们准备选出二百多种比较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刊物，作出比较详细的介绍。考虑到许多刊物现在不易见到，在介绍时适当多引些原文，以便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参考。另外，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个时期的思想面貌，我们还介绍了若干种报纸。

本书分五集出版。每集介绍若干种，着重研究和介绍刊物的内容，包括刊物的性质，主要言论和倾向，在重大政治事件和思想斗争中的态度，对中国社会（包括风俗习惯）的认识和有关中国文化的观点，对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看法和介绍，以及刊物的编辑出版者、主要撰稿者、刊期、版式等，也尽可能作一些说明。

本书是期刊介绍的文集，提供稿件的有各地各方面的同志，因

^① 这里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实际上是指辛亥革命前后，上起1900年，下迄1918年（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此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就难免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的。因为这不是一本专史，也就听其自然，这点也请读者注意。

编写辛亥革命前后的期刊介绍，是一项相当复杂繁重的工作。除少数刊物比较齐全外，大多分散在各地，有时一种刊物由几个地方收藏，哪里也不全。因此曾得到许多地方的同志和图书馆的帮助和协作。

为了组织稿件，我们成立了一个编辑小组。编辑小组的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新闻研究所的丁守和、何炳然、刘志琴、赵金钰、刘仁达、范明礼同志，并邀请金冲及、陈旭麓、张寄谦、张磊、刘立凯、胡绳武、汪熙、方汉奇同志参加指导。

第五集介绍的刊物共四十二种，另有综合性介绍八篇。其中《警钟日报》、《民立报》等是革命派的著名报刊；《大中华》、《少年中国》等与改良派有关；《义声报》、《护国军纪事》反映了云南护国军起义的情况；《民铎》、《太平洋》、《学艺》是学术性刊物；《南开校风》、《敬业学报》是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前主编的刊物；《小说月报》、《南社丛刻》、《真相画报》、《新剧杂志》以及《礼拜六》等是文艺性刊物；还有著名报纸《大公报》，等等。综合性介绍涉及白话、教育、公报等类和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区的报刊。本集由范明礼、何炳然、赵金钰同志负责编辑。

本书五集已编写完。共介绍各种刊物二百五十二种，另有综合性介绍十一篇。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范明礼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王学庄、耿云志、杨天石、夏良才等同志给予多方面的协助，人民出版社的吕涛同志花了很多力量审阅稿件，提出很多好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可能有不少缺点错误，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大公报	何炳然(1)
警钟日报	王世理(42)
京话日报	方汉奇(57)
粤西	卢仲维(70)
广西杂志	卢仲维(78)
小说月报	范明礼(82)
南社丛刻	孙继林(110)
民立报	王俯民(120)
妇女时报	徐楚影(150)
真相画报	范明礼(159)
中国学报	张绍宗(174)
少年中国	刘俐娜(180)
中国实业杂志	栗鸿孝(188)
大中华民国日报	郑和平(195)
中华实业丛报	闵 杰(209)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	虞和平(221)
南开校风	廖永武(243)
敬业学报	廖永武(257)
礼拜六	徐斯年(266)
新剧杂志	熊月之(281)
滇声报	李慧琴(293)

女子世界	刘巨才 (302)
大中华	曾景忠 (310)
科学	卢仲维 (326)
中华学生界	武振江 (335)
国学杂志	张显菊 (347)
妇女杂志	徐楚影 陈新毅 (351)
国货月报	陈正书 (362)
世界观	匡珊吉 (370)
新中华	胡正豪 吴根梁 (379)
大夏	张显菊 (389)
义声报	郭惠青 (393)
护国军纪事	卢仲维 (404)
福建劝业杂志	李 戈 (415)
民铎	王俯民 (420)
丁巳	李 戈 (432)
中论	李 戈 (438)
太平洋	刘巨才 (445)
学艺	刘俐娜 (461)
广仓学会杂志	卢汉超 (470)
戊午杂志	张显菊 (479)
戊午周报	匡珊吉 (484)

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

白话报刊	蔡乐苏 (493)
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期刊	
简介	张小平 陈新毅 史复洋 (547)
近代公报类期刊简介	陈新毅 史复洋 (579)

辛亥革命时期的北京报刊	黄河(603)
常州光复后的报纸	赵争(612)
晚清浙江报刊录	史和 姚福申 叶翠娣(618)
辛亥前后的武汉报刊	刘望龄(637)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	李默(673)

大 公 报

(一九〇二年六月——一九一六年九月)

《大公报》，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在天津创刊，至一九四九年停刊^①，历时四十七年。按其几易报主，可以分为：(一)英敛之经营时期(一九〇二年六月至一九一六年九月)，(二)王郅隆经营时期(一九一六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经营时期(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本文只介绍辛亥革命前后英敛之经营时期的一些情况。

一、英敛之及其办报宗旨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一八六七年生于北京。“家世寒微，先代无达者。”他目睹当时的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很早就“酿成第二天性”：“愤世嫉俗”，向慕“忠臣肝胆、侠士心肠诸美德”；特别痛恨“奸贪误国、豪暴虐民”的“达官显爵”。^②严复曾送他一幅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③他二十二岁，信奉天主教，懂得一点法文，并和外国人发生联系，接触到一些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知道那里“民权充盛，民智开通”^④。他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逐渐富强起来。一八九八年，英敛之撰文《论兴利必先除弊》，对康有为的

①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版《大公报》停刊。旋改名《进步日报》出版。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17日上海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

② 以上本段引文，见英敛之，《金锄侯君年谱叙》，1908年6月4日《大公报》。

③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9辑，21页。

④ 《说官》，1905年8月17日《大公报》。

一些政治主张表示赞佩：“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①戊戌变法失败，英敛之离京潜往外地。但他仍长期坚持维新思想。一八九九年八月，《知新报》转录了他在《国闻报》上发表的《党祸余言》，说“感痛郁结，情不能已”^②。对慈禧的重新擅权，表示不满。一九〇〇年以后，清王朝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不但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基层群众到处埋伏待燃的火种，就是上层社会的一些阶级、阶层，也都对清政权普遍表示不满。但那时：“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京津一带，在清廷的直接控制下，舆论界更是死气沉沉。一九〇一年春，英敛之从上海回到天津。他的天主教友、资本家柴天宠等“愿设报馆”，邀他“主持其事”，并“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赔垫”^③。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大公报》就在天津呱呱堕地了^④。

该报创刊时，竹纸印，书版式，直排，细线版框，日出八页，每页二面。每天除报头、广告占三面外，大约刊登各种消息、文章一万多字。它有代派处六十五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国外如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都有代销点。开始时，日印三千八百份，三个月后，增至五千份，成为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版面、栏目的安排是：第一面是报头“大公报”，上方另加法文名字“L'Impartial”（意译为无私）。报头两边刊中西历年月日。第二至十面，以次刊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路透电报、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等。第十一谕至十六面，刊登译件、附件、广告等。

①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9辑，4页。

② 英敛之：《党祸余言》（录《国闻报》），《知新报》97册，1899年8月26日。

③ 《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第242页。据王芸生先生查考，当时参加该报股本的还有：安福系官僚资本家王郅隆、资本家张连璧、天津法国领事馆翻译、天主教徒李敬宇、天主教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等。参见《文史资料选辑》9辑，7—8页。

④ 创刊时，社址设在法租界6号路乙（现为哈尔滨道42号）；1905年9月5日，迁日租界旭街21号（现为和平路241号）。

该报新闻，以宫廷、官场动态为主，有时也刊少量社会新闻。新闻通讯，主要辑录转载上海的报刊材料。从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起，开始用“路透电报”，报道国外消息。

该报重视评论工作，以论说^①为主。一九〇八年以前，论说较少，平均每月发二十篇左右。一九〇九年以后，几乎每天发一篇论说和两篇闲评。此外，它还经常发表一些带有评论、思想漫谈性质的文字。如从创刊号起，就在最后一版的一个固定地位辟附件栏。几乎每天登一篇，每篇千字左右。附件用白话写作，后来又改称“白话”。在当时华文日报中，用白话来写这种带有思想评论性质的文稿，它是一个创举。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该报又辟闲评栏。最初，几天登一篇；一九〇八年六月十八日以后，每天固定发两篇。

英敛之在创刊号《大公报序》中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拒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②申言：“其他乖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摈焉。”^③他主张多登“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④的文字和议论。

创刊后第二天的《大公报出版弁言》，大力揭露了慈禧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腐败朝政，说：“盱衡时事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凡可以涣吾民心阻我进步者，一一锄之务尽，咸与维新。亦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文章明确表示：它要“知无不言”。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

① 早期论说不署名者，多为英敛之所写。1905年8月21日后，论说改称言论。1916年11月7日后曾改称论评、社说等。1926年9月8日起改称社评，以后即沿用此名至停刊。

②④ 英敛之：《大公报序》，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

③ 《再讲看报的好处》，1902年6月23日《大公报》。

“意存规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了该报后来发表评论的一个很大特点——“敢言。”

二、大胆揭露封建官僚制度

该报创刊后第五天，就发表《论归政之利》，开始在慈禧头上动土。文章强调，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官闾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它还指名道姓，痛骂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它对张之洞、盛宣怀等，也经常遇事讥评，给予警告和抨击。

应该指出，该报对慈禧提意见，是有一定限度的。它痛斥的主要是那帮“旧党”、“小人”刚毅、荣禄之流。它只是要慈禧撤帘归政，也不是要打倒她。它的批评锋芒，主要是针对皇帝以下那些枢要部门的权奸旧党和各级衙署的贪官污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报与袁世凯整整顶撞了十年，始终不屈，名满全国。

一九〇二年，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而《大公报》压根儿不买帐，经常点名批评天津税政。一九〇五年，它热烈响应华工拒约运动，积极鼓动天津人民抵制美货。这年八月，袁通过天津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八月十七日，该报一版头条刊登了总理英敛之、主笔刘孟扬的联名《特白》，痛诉该报因抵制美约，“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同一天，论说栏还发表英敛之写的《说官》，带有影射性地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要“拔凶邪、登俊良”，“洗涤刮磨”那些“当权”胡作非为的大官。否则，就“永无改革之望”，就“永无起死回生之一日”。接着，又连续两天，既发表论说，又刊登附件，表示一定要发扬“诸葛孔明坚卓不挠的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九〇八年该报回顾这段历时，写道：“犹忆乙巳之秋被禁之时期，而售报转增，其多数置之死地而后生，天下事大抵然欤。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金石，虽万劫千魔、酷炎毒疠，而不

能损害其丝毫者也。当飞沙昼冥，怒涛山立，正不知危险奚似，犹有风静潮平，安致今此之一日！”^①后来，袁见用强力迫害无效，几次想以利诱办法收买。但都被英敛之拒绝了。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摄政王载沣执政，袁世凯被开缺回籍。该报历数其罪责：“戊戌政变，袁世凯之获罪于景皇帝深矣。……设非袁世凯节变于中途，则中国今日当为世界上之第一等国矣。今中国之不能与各国比肩，袁世凯迟之也。景皇帝之忧郁终身不得行其志，袁世凯致之也。”^②后来，那桐说袁世凯“办理外交，有功北洋”，力保再用。该报又针锋相对，发表闲评说：“据吾人所见，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权利未必多授外人；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财政未必如此困难；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冗员未必如此之多；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民气未必如此之缓。”^③该报如此坚决、长期反对骄横不可一世之袁世凯，在当时舆论界，可称首屈一指。

清末官场，乌烟瘴气，魑魅魍魉，无所不有。该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蚤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谷木之蠹虫。这是形象的描绘，也是真实的写照。

原来，该报还想用所谓“开官智”、“清宦途”等办法，进行修缺补漏的工作。后来，看到“新政”败坏，江河日下，连清政府的最高层衙门，也腐败不堪。《忧俗篇》说：“夫政务处者，为办理新政而特设者也，今且以不办事为宗旨矣。军机处者，枢要之地也，今且以交情之厚薄、行贿之多寡为用人之权衡矣。”^④上层如此，下层怎样？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六日，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东陵苛政》

① 《本报二千号征文广告》，1908年1月21日《大公报》。

② 《对于政府退袁官保之确评》，1909年1月16日《大公报》。

③ 《袁世凯之保语》，1909年9月11日《大公报》。

④ 《忧俗篇》，1902年8月4日《大公报》。

说：有某君游历遵化，至热河，“突见一带居民纷纷逃避，声称东陵派队搜山，驱逐山内之人，以致数县百姓惶惶大丧。某君颇涉疑惑。虚心采访始悉，乃守陵官员，因后陵风水地方，有附近愚民盗伐木植，派队剿捕。惟查东陵在遵化，何至搜至热河所属黑水峪一带？彼此相隔四百余里，岂尚为东陵风水地乎？况细询多系民地民居民植之物，该兵队亦指为官地。更奇而惨者，凡民间屋内若有寿材木料等类，皆指为盗伐之物，苛索滋扰，山居之民比户震惊。以此首善之地，竟有如是之苛禁，致使无辜被累，亦可悲矣！”鉴于以上种种，所以，该报对于一九〇五年以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更改官制等，越来越感到失望，而用三个字把它概括，叫做“变戏法”^①。

严重的是，这种弄虚作假、衰败腐烂的现象，不仅从上到下，而且东西南北中，遍及全中国。所谓：“今岌岌之势，日蹙一日。综观二十行省之中，均现黯败之色，无一毫活动之生机。”^②

下面，请再读一读该报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说妖孽》中的两段精彩议论和描绘，以见清廷覆亡前夕官场腐败之一斑：

“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聚三五衰朽于一堂，旅而进焉，旅而退焉。聆彼口头禅，未尝不私忧窃叹云：大局之阽危，救国之不容稍缓。然而呈之于事实者，无一不颠倒错乱为图危图亡之谋。以言内政：则一面言预备立宪，一面仍拥护专制也；一面言严禁苛敛，一面仍搜括民财也；一面言发扬民气，一面仍增益官权也。以言外交：则一面言自保主权，一面又曲徇要求也；一面虑外资充斥，一面又恣借洋债也；一面言慎重领土，一面又断送山河也。对于内，则为滑稽之政府；对于外，则为柔媚之政府。其变态之灵便，虽狐蛊不能喻其神。外此，则惟是揽权骹法，罔上营私。声色宴游为平章军国之重事，子女玉帛乃进退人才之权衡。既自任以天下之重，而而为国为民之念，曾未尝一动于中。靡论其识之不济也，就令有一事

① 《闲评》，1907年11月6日《大公报》。

② 《保定之四现象》，1907年4月13日《大公报》。

焉，明明知为国利民福，然或以不便于己之故，从而阻挠之。且不肯显言破坏，必出以旁敲侧击。或嗾他人之争论，而阴为主持；或托慎重之常谈，而徐图消灭。己不居反对之名，而实较反对者之阻力为尤烈。衮衮诸公，所持为唯一之方针者，如是焉耳矣。此妖孽中势力最大之一种也。

“仕宦之场，一妖孽荟萃之区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尝有丝毫图治之心。其所以孽孽矻矻，漏尽钟鸣而不肯暂止者，无非为保利禄长子孙计耳。自破格用人之说起，而官吏之流品杂；自卖差鬻缺之风盛，而官吏之心理变。以奴颜婢膝为手段，以白璧黄金为代价。在上之权贵，更依托之以为招徕之术，且美其名曰运动。遂令热中者流，载宝而朝，挈金而市，胥皇皇焉以为进身之媒。人才之长保以此也，卓异之荐荐以此也。有若金店、有若妓寮、有若饭庄、有若寺观、有若骨董鬼、有若婢媼仆妾。举万有不齐之人类，悉变为官吏投资之场。甚至公署堂皇，大庭广众，昌言评鹭曰：某也，运动某大老而得之；某也，运动某贵人而得之。对于运动而已得者，则群羨其能；对于运动而无效者，则竞笑其拙。万其人一其心，百其途一其准。斜封墨敕，大开幸进之门；红粉朱提，尽是显扬之具。纷纷扰扰，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及其既得，乃不得不谋利市三倍之赢。于是害民贼出其中，卖国奴出其中。互相倾轧、互相朋比之事，无一不出其中。鬼耶、蜮耶、罗刹耶、灵狐耶，吾又何从而定之！此妖孽中蕃衍最盛之一种也。”

该报还大胆反对清廷株连党祸，惨杀党人的种种暴行。

一九〇三年，新闻记者沈荃在报上公开揭露了“中俄密约”的内容。七月十七日沈荃被捕。三十一日慈禧下令将沈荃“立毙杖下”。八月二日该报全文刊录了沈荃临刑绝命词四章；九月十六日，又续刊：“探闻刑部司官，自杖毙沈荃后，托故告假者颇多。皆以杖毙之惨，不忍过其地。出而述其始末，照录于后，以补各报之缺。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

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沈葆惨案传出后，中外震惊，“西人闻之皆胆寒”。这件惨案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若大公愤、若大影响，与该报连续绘声绘色地报道、评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九〇七年七月，清廷先后杀害了徐锡麟和秋瑾。七月三十日，该报发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说：“近自皖抚被刺案出，警电纷驰，南北大吏咸有戒心。而一般趋承小人，邀宠冒功，多方株连。风声鹤唳，举国骚然。……乃不旋踵而女教习秋瑾以正法闻，旬日间各处以捕获余党闻。风之所靡，波及全国。来轸方遒，正不知其所底止！”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犹剖其心，啖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以一女子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为党于革命，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翌年，清政府御史常徽奏请平毁秋瑾墓，并要“查办葬秋之人”。该报又连连发表评论表示反对。

载沣执权后，有人提出应开放党禁，宽赦戊戌时期的维新党人。顽固派则表示反对。该报一再发表评论，而且把批评矛头直指现任“某相国”张之洞，痛斥他“历仕三朝，身负天下之重望，而其所私心忿恨，日日落井下石者，乃在党人。……假令八年以后，宪政风行，党人群起效用，恐阁下虽可为专制时代之功臣，而亦不免为立宪时代之罪人矣”！^①

慈禧活着时，该报希望通过光绪亲政，达到宽赦维新党人的目的；慈禧死后，它就大声疾呼，为他们鸣冤平反了。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五日，该报在言论栏刊登一篇来稿，直接建议清廷降旨宽赦康有为、梁启超等。

有人说，该报之敢言，是由于它设在租界，有洋人保护。对清政

① 《异哉，某相国》，1909年7月19日《大公报》。

府的批评,是“不负责任地乱说乱道”^①;是为了挽救清王朝、消磨人民革命斗志。笔者认为,这些看法不够全面。诚然,广大读者对于该报坚持“保皇”,是很鄙屑的。但人们仍然称道它那种“敢言”精神。这是有原因的:

第一,该报之“敢言”,其实质意义在于:它是戊戌时期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继续。在二十世纪初,它仍然具有一定爱国的反封建的性质,起着若干启蒙作用。而这种启蒙作用,是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至于说报馆设在租界,并不是它“敢言”的内在根据和实质原因。不然,那时在租界的报刊不少,为什么有的就不“敢言”?

第二,清末吏治,已经腐败到了极点。该报猛烈抨击、揭露官僚权贵们奸贪误国的种种罪责。虽然这种揭露和抨击是枝节的、局部的,不可能根本改变整个腐朽制度;但它为老百姓鸣了不平,出了冤气;有时还能起到遏制恶势力横行无忌的作用,从而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群众的利益。该报的“敢言”精神所以长时期为人们所不忘,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开国会、订宪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一九〇一年一月,清政府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蛰伏了三年的改良派人士,首先抬头伸腰。他们对于以慈禧为首的假变法半信半疑;他们仍积极要求祛除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该报发表《论中外强弱不同之大原》说:“我中国日言学西法,而徒慕其表面之形式,而不取其里面之精神”;“上以权力制国民,下以狡诈伤同类”。“故不欲振兴中国则已,如欲振兴中国,第一当去其压制之手段。”

该报反对封建专制,但不赞成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它在《说公》中说:“夫共和之政体,固属极公。若国民

^①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9辑,39页。